

唐

鳴

叢

書

初唐四杰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初唐四杰/罗敏中 肖希凤选注. —湖南: 岳麓书社,
2000

(鹿鸣丛书)

ISBN 7-80520-993-6

I. 初... II. ①罗... ②肖... III. 初唐四杰-选集
IV. I222.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8278 号

责任编辑 徐耕白

封面设计 黄朝

初唐四杰

罗敏中 肖希凤选注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5.125

字数: 350,000 印数: 1—3000

ISBN 7-80520-993-6

I·504 定价: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 湖南省衡阳市园艺村九号 邮编: 421008

编辑缘起

一九九六年岁末，正是岭南梅萼溢香的时节，我参加深圳书市，得遇老友徐耕白。耕白兄是岳麓书社编辑，我们所谈，当然以书为主。这一夜，从华灯初上到云淡星稀，我们商量编一套古代诗文丛书。然而，目下古代诗文选本如过江之鲫，我们如何出新呢？

我们以为，诗文以风格区分者，古已有之，今不乏见。如梁简文帝标宫体之目，杨亿、刘筠、主西昆之派，乃至宋词有豪放、婉约之分，皆为此类。以地域区分者，古已有之，今不乏见。如《隋书》明江左、河朔之辩，刘师培申南北文学不同之论，乃至江西诗派、桐城义法，皆为此类。以时代区分者，古已有之，今不乏见。如唐诗有初盛中晚之论，宋词有南北两宋之说，乃至元和、新体、大历诗风，皆为此类。而以群体区分者，古亦有之，而现今选本则较为罕见。

所谓文学群体，即生活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下的有一定关系的文学同道。他们或为朋友，或为师生，或为亲属，切磋琢磨，诗文相激，史所称艳，人所乐道。如建安七子、竹林七贤、眉山三苏、苏门四学士、公安三袁、吴中四子、扬州八怪等等，既有典可据，亦光耀夺目，宛若文学星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星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方面的诗文选本却较为少见。基于此种考虑，我们决定编辑一套文学群体的诗文选集，本《诗经》、《呦呦鹿鸣》，「求其友声」之义，取名为《鹿鸣丛书》。

历时年半，现在丛书已推出第一辑。坦白地说，我对这套书确有一点敝帚自珍。这倒不全是在其中东倒西歪屋，零落琴剑书，竹影横斜半帘风那般古意沁人；也不全是其中月夜榭廊，冰肌无汗，杏花影暗玉人箫那般旖旎煽情。我觉得，贯穿其中的『群体』是一根看不见的线，线之末梢系一片云水，如轻烟，如惊鸿踪影，浸淫其中久之，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当是别有会心的。

在选材方面，我们诗词文赋均收，思想性、艺术性兼顾。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，附作者小传和简注。记得六年前钟叔河先生指导我注释唐诗，排印时就只将诗句分隔而不作标点。照钟丈的话说：『标点都是后人所加，去除后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古人之意吧。』我们这套书一本钟氏之旨，诗词均只分句而不标点，这也可算是一点出新，请读者诸君鉴察。

这套书的编注者都是古典文学工作者，由于水平有限，缺点在所难免。然而，我们的工作是真的。尽管『认真』这两个字被某些人厌弃。或者嫌它过于沉重，或者责怪它束缚了自我。宋人诗云：『古人冷淡令人笑，湖水年年到旧痕。』我想，古人当是不会取笑『认真』的。

以上谨略叙《鹿鸣丛书》编辑缘起、义界、体例及从事者的态度，尚祈十方大德，不吝教之。

江河不废 四杰流芳

又是金秋九月，天高气朗。

赣江北去，流水滔滔。

滕王阁高高耸立，溢彩流光。

这是大唐的骄傲，是大唐帝国带来的新气象！永徽中，帝子滕王李元婴来南昌做刺史，修建了这座巍巍高阁，人称滕王阁。近二十年间，这座巍巍高阁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赏。但自古名园名楼，须有名诗名赋为之渲染张扬，楼以文传，文以楼传，相得益彰。司马相如作《上林赋》，曹植作《铜雀台赋》，气势磅礴，文采斐然，皆为一世之盛事，垂之后世，谓之不朽。滕王阁矗立于赣江之滨以后，也有好事之徒，附庸风雅，舞文弄墨，然而，竟没有只字半句话流传下来，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。

今天，滕王阁中传杯递盏，新任刺史阎某举行盛大宴会，招待他邀请来的东南才俊之士，要在会上请诸位俊彦一显身手，写出与名楼同样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。只见他时而站在诸位俊彦旁边，高声朗吟他们写出的珠玑佳句，时而高举酒杯，为诸位俊彦加油助威。

号称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的到来，使阎某喜不自禁。王勃是当今最负盛名的才子。六岁能诗，号为神童。十九岁的时候，入沛王府做幕宾，孩子气十足地写了一篇游戏文字：《檄英王

鸡文》，被皇帝指斥为挑拨诸王关系的祸端，逐出王府。此事让王勃的政治生命大伤元气，令他后悔不已。但是，『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伏』，这件事却使王勃更加才名远播，四海知名。此后，他远走西蜀，求任虢州参军，都少不了与一班文友唱和应酬，也少不了为人做诗做序。但是，这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。他的理想并不是要做一个大才子，而是要出将入相，经纬天下。他的祖父王通是隋末大儒，曾见过隋文帝杨坚，陈述治国大略，未被采纳；退而讲学，教授了一大批门徒，其中如薛收、杜淹、房玄龄、魏征，都是当朝政要，显赫一时。在王勃的心中，潜藏着祖辈梦寐以求的理想；在王勃的血管中，流动着祖辈顽强求伸的血液。为了实现这个理想，王勃的父亲王福畴，奔走于王通这些弟子门下，希冀借助他们的力量，登上政治舞台，但收效甚微。不仅如此，现在，他还受王勃的牵连，贬为交趾令。王勃此次参与滕王阁盛会，就是去交趾看望父亲，途经南昌而巧遇的。此时的王勃，经过几个起落，大约对仕途已经心灰意冷，而专意于诗文了。宴席中，众人的目光，也都一齐投向王勃的座席，看这位大才子笔下，如何飞出胸中的文章锦绣。只见王勃起笔写道：『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』众人心里说道：『也是老生常谈。』又见接下来写道：『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』阎公矍然而起道：『此真天才，当垂不朽矣。』众人大声喝彩，一齐鼓掌。等到王勃写完最后一联诗句：『阁中帝子今何在，槛外长江空自流。』宴会的气氛达到高潮，众人差不多要把这个年轻人抛起来了。大家都为一篇不朽名作的诞生感到高兴，也为自己能参加这一盛会，看到这一不朽名作的诞生感到高兴。

这段故事本于五代王定保编撰的《唐摭言》，笔者有所加工改造。《唐摭言》本身也并非真

确的史实，揶言者，拾取他人之言也，其中不免带有传闻和夸张，真实可靠的程度自然会有一些折扣。且看《揶言》原文：

王勃著《滕王阁序》，时年十四。都督阎公不之信，勃虽在座，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，已宿构矣。及以纸笔巡让宾客，勃不辞让。公大怒，拂衣而起，专令人伺其下笔。第一报云：『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』公曰：『亦是老生常谈。』又报云：『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』公闻之，沉吟不言。又云：『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』公矍然而起曰：『此真天才，当垂不朽矣。』遂亟请宴所，极欢而罢。

这里，关于王勃『时年十四』的说法，就很令历代求实的学问家们花费了许多脑筋去甄别求真，然后认为，其当于赴交阯省父途中经过南昌而作，时年应是二十多岁。又如，『孟学士为阎公之婿』的说法，显然是根据王勃序中的孟学士加工制作出来，因为在王勃序中，既未交代孟学士姓甚名谁，在《揶言》中，也未向我们提供这一方面的新东西，但是，加进了孟学士是阎公之婿的想象，使我们看起来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。而阎公观王勃作序的『三部曲』，情节紧凑，层层递进，到公认的名句『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』形成高潮，嘎然落笔。更纯乎是『小说家』的笔法了。元人辛文房作《唐才子传》，看出了里面的一些问题，将这一段故事修改为：

父福畴坐是左迁交阯令，勃往省觐，途过南昌。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，九月九日，大会宾客，将令其婿作记，以夸盛事。勃至入谒，帅知其才，因请为之。勃欣然对客操觚，顷刻而就，文不加点，满座大惊。酒酣辞别，帅赠百缣，即举帆去。

辛文房不相信王勃《时年十四》的说法，又省去了《阎公怒勃》及《观勃作序》的戏剧性情节，改为《帅知其才，因请为之》。又将《婿孟学士者》模糊化为《其婿》。其实，在《滕王阁序》中，孟学士是一个象征性人物，并非实指，我们只要看下旬「王将军」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，就可以知道这一点。笔者综合前人研究，仍以《揆言》的故事为蓝本，作了一点加工改造，想来更接近事实。

更有将王勃作序的故事神话化的，谓王勃得风神相助，一夜舟行七百里，从马当山赶到南昌预此盛会，就更加是《神话家言》的笔法了。

虽然这些《小说家言》、《神话家言》未能在王勃《滕王阁序》本体上向我们提供更多的背景，但是，我们却可以从这些《小说家言》中看出另一方面的现实：这就是王勃在这篇序中洋溢的才华获得了广大的读者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《滕王阁序》最终奠定了王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一些考据家们费尽千辛万苦，考据出名句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」，原来出自庾信的《马射赋》「落霞与芝盖齐飞，野水共春旗一色」，并有多人运用，成为成句，骆宾王集中也有「断云将野鹤俱飞，竹响共雨声相乱」的诗句。但是，人们还是只记住了王勃的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」。庾信及骆宾王们的句子，则对不住，通通忘记了。比照庾信的原句，无限想象的空间，从而能够使人生发出无穷的意味。

《滕王阁序》成为一座文学史上的高峰，人们对她望而生敬。中唐韩愈作《新修滕王阁记》，自言：「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，而滕王阁独为第一，有瑰伟绝特之称。及得三王所为序、

赋、记等，壮其文辞，亦欲往一观而读之。工既讫功，公以众饮，而以书命愈曰：「子其为我记之。」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，窃喜载名其上，词列三王之次，有荣耀焉。」以韩愈在当时文坛上的声名、地位，对其人其文，尚推崇如此，以名列其次为荣，更何况他人？然名家即如韩愈，其《修闾记》并未流传开来，三王中另外两王的作品：王绪的赋和王仲舒的记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此足见王勃序的精妙和不朽，虽历经岁月磨洗，反而更加光彩照人。

其实，王勃作诗文时是很辛苦的。传说他作文时，先磨墨数升，然后用被子蒙面，躺在那儿，运神凝思，想好以后，一跃而起，奋笔疾书，不加点窜，一挥而就。这就是「打腹稿」这一成语的来历。这也印证了「天才出于勤奋」这句话的正确。鲁迅说他是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工作的，这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，古今中外凡有成就的人莫不如此。

王勃在诗文方面的成就，可以从他的叔祖父王绩那里找到渊源。王绩是唐初的著名诗人。与哥哥王通不同，王绩对做官和做学问都不感兴趣，而以阮籍、刘伶、陶潜为师，简放嗜酒，以做诗文为乐，且为时之冠。纪昀等称其文「疏野有致」，其诗「气格道健，皆能涤初唐俳偶板滞之习，置之开元、天宝间，弗能别也」。王勃大约受这位祖辈的影响，在做官不成之后，转而以倡导诗文革新为己任，并且成为初唐四杰之首。他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「四杰」名列第二的是杨炯。杨炯同王勃是「老庚」，孩提时亦有神童之誉。传说他对这排名很有意见，说过「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」的话。张说认为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。他称赞杨炯「文思如悬河注水，酌之不竭。既优于卢，亦不减王。」「耻居王后」，确实是那么回事；「愧在卢前」，只是杨炯的「谦虚」罢了。按照张说的说法，杨炯是应该而且可以雄踞「四杰」之首的，但

是，公众和历史却开了个玩笑，让他屈居了第二，个中的原因待下再说。这里我们先从杨炯的言论中，看看他对王勃和卢照邻的态度，看看他是不是这样一个狂妄自大、轻薄傲慢之徒。我们看他在《王勃集序》中的两段话：

幼有钩衡之略，独负舟航之用。年十有四，时誉斯归。太常伯刘公巡行风俗，见而异之，曰：『此神童也。』因加表荐，对策高第，拜为朝散郎。沛王之初建国也，博选奇士，征为侍读。奉教撰《平台钞略》十篇，书就，赐帛五十匹。先鸣楚馆，孤峙齐官。乘忌侧目，应刘失步。临秀不容，寻反初服。远游江汉，登降岷峨。观精气之会昌，玩灵奇之肝蜚。考文章之迹，征造化之程。神机若助，日新其业，西南洪笔，咸出其辞。每有一文，海内惊瞻。所制《九陇县孔子庙堂碑文》，宏伟绝人，希代为宝，正平之作，不能夺也。

尝以龙朔初载，文场变体，争构纤微，竞为雕刻。糅之金玉龙凤，乱之朱紫青黄。影带以徇其功，假对以称其美。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。思革其弊，用光志业。薛令公朝右文宗，托末契而推一变；卢照邻人间才杰，览清规而辍九攻。知音与之矣，知己从之矣。于是鼓舞其心，发泄其用。八紘驰骋于思绪，万代出没于豪端。契将往而必融，防未来而先制。动摇文律，官商有奔命之劳；沃荡词源，河海无息肩之地。以兹伟鉴，取其雄伯，壮而不虚，刚而能润，雕而不碎，按而弥坚。大则用之以时，小则施之有序。徒纵横以取势，非鼓怒以为资。长风一振，众萌自偃。遂使繁综浅术，无藩篱之固；粉绘小才，失金汤之险。

积年绮碎，一朝清廓。翰苑豁如，词林增峻。反诸宏博，君之力焉。

从这两段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杨炯对王勃的文学才华，是推崇备至的；对王勃的文坛盟主地位，也是肯定和心悦诚服的。对卢照邻在文学革新中的作用，也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。他对王、卢二人的态度是真诚的，丝毫没有『愧前耻后』的闹意气的情绪。我们不排除在某种特定场合杨炯确曾说过『愧前耻后』的话。但是，当我们冷静地、全面地来分析、看待杨炯对王、卢二人的态度时，也就不能只以『愧前耻后』这样一句话来否定他们之间在文学革新活动中的互相支持，互相鼓舞，互相促进，共同推进文学革新进程，并取得了文学革新的实效。否则，我们就很难评定『四杰』在初唐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。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，并不要我们去拔高。

从这两段话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杨炯的文学革新意识，在『四杰』中是表现得最为自觉，最为明确的。他是『四杰』中的文学革新理论家。这种自觉和明确，同时表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，这就是在诗歌创作中，大量采用乐府旧题，用乐府民歌的质朴之风，来冲刷六朝以来的绮靡和形式主义的诗风，反对当时的『上官体』。如现在流传较广的《从军行》：『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，铁骑绕龙城。雪暗凋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』就是用乐府旧题写的。诗中笼罩的边地军情紧张、激烈气氛，以及诗人渴望驰骋疆场，建功立业的思想愿望，跃然纸上，一扫六朝以来的绮靡和宫廷诗人的艳丽，表现出初唐时中下层知识分子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其他如三峡诗：《广溪峡》、《巫峡》、《西陵峡》，以

及其他以乐府名篇的诗歌，都表现出一种追求革新的意识。从这个方面说，杨炯是可以做「四杰」的首领的。杨炯的失，在于他没有拔尖的代表作，因此，在「四杰」中相形见绌，甚至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来注释他的全部诗文。

据说卢照邻对这排名也有意见，张鷟《朝野僉载》说：「世称王、杨、卢、骆，照邻闻之，曰『喜居王后，耻在骆前』。」没有提到排在他前面的杨炯。从上面引述的杨炯的两段话推测，大约王、杨、卢的关系比较密切，交往也比较多，在文学革新中协同作战，互为知音、知己。卢照邻对王、杨是十分推崇的。他在《五悲·悲才难》中说：

近有魏郡王君曰方，华阴杨氏曰亨，咸能博达奇伟，覃思研精；征孔门之礼乐，吞鬼谷之纵横；岳秀泉澄，如川如陵；高谈则龙腾豹变，下笔则烟飞雾凝。王则官终于郡吏，杨则官止于邑丞。何异乎操太阿以烹小鲜，飞夜光以弹伏翼？
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里所指，就是王勃、杨炯。文中所叙生平事迹，与王勃、杨炯完全吻合。至于其中称「魏郡王君曰方，华阴杨氏曰亨」，名字、籍贯有异，乃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假托的手法，陶渊明作《五柳先生传》，打头便说：「先生不知何许人也，亦不详其姓字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」这就是假托手法；陶渊明假托五柳先生之名，写自己的兴趣、爱好，为自己作「传」。卢照邻在这里也是用的这种手法，假托「魏郡王方，华阴杨亨」的籍贯、名字来叙述王勃、杨炯的生平事迹，为他们作「传」，对他们的文学功绩表示崇敬。对骆宾王，或者因为宾王曾作《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》，引起照邻不快，因此就有了「耻在骆前」的说法了。

卢、杨二人在文学革新中步调一致，无论在理论上，还是在创作上，都互相声援，互相呼应。在《南阳公集序》中，卢照邻指出了六朝以来追求形式主义的弊病：

八病爰超，沈隐侯永作拘囚；四声未分，梁武帝长为聋俗。后生莫晓，更恨文律烦苛；知音者稀，常恐词林交丧。《雅》《颂》不作，则后死者焉得而闻乎？

对形式主义的诗风文风窒息文学的发展，表示了极大的忧虑。但是，他没有杨炯那样的勇气和胆量，直斥当代的『上官体』，接下去只是对当代文坛作了一个正面的扫描，称颂虞（世南）、李（百药）、岑（文本）、许（敬宗）之俦，王（珪）、魏（征）、来（济）、褚（亮）之辈的文章材术，这大概也是他甘居杨后的原因。

卢照邻的勇气和胆量表现在创作上。他以反映较为深广社会生活的诗文，对只描写宫廷生活的『上官体』应制诗发起了冲击。他的代表作《长安古意》，以对比的手法，前面以大量篇幅，描绘上层贵族骄奢豪华的生活，揭示富贵不能长久的历史辩证法：『节物风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须臾改。昔时金阶白玉堂，即今惟见青松在。』结尾用寥寥几笔，写出在这骄奢豪华生活帷幕下帝京下层知识分子的清贫与清高，唯有他们可以流芳百世：『寂寂寥寥扬子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。独有南山桂花发，飞来飞去袭人裾。』在这些描绘中，卢照邻使用了，与『上官体』同样的绮错婉媚手法，但表现的主题思想却大相径庭，扑朔迷离，人所莫测，故张鷟《朝野僉载》说：『如卢生之文，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。』他晚年所作《释疾文》、《五悲》，把亲身体验到的一生坎坷与贫病交加的悲苦，联系社会上种种不平的现象，用诗文的形式释放和表现出来，更具有深广

的社会意义，历来为人们所传诵。

卢照邻也创作了大量的以乐府名篇的诗歌，如《战城南》、《紫骝马》之类，利用「复古」的形式，来进行文学革新。这种形式的文学革新，从「四杰」开始，此后，中唐韩、柳，宋代欧、苏的古文革新运动，明代的前后七子，清代的桐城，无不以「复古」为旗号，来进行文学革命，只是「四杰」的旗帜还不那么鲜明。

「四杰」生当初唐，新生王朝显示出来的新气象，曾经激发起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投身仕途的热望，表现出与汉末以来中下层知识分子慕求隐居的不同价值取向。「四杰」中，骆宾王最为投入。在王、杨、卢相继碰壁，心灰意冷之际，骆宾王热情不减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他坐过牢，从过军，最后参加了徐敬业领导的倒武战争，兵败被诛。但是，这种复杂多样的经历，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。他的许多名篇，如《在狱咏蝉》、《萤火赋》、《畴昔篇》、《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》，就是在这种经历中，反映这些生活的不朽之作。其中，《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》使骆宾王的声望达到了顶点。据说檄文传到朝廷，武则天听后，只是哂笑。至「一杯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」两句，神色突变，问道：「这篇檄文是谁写的？」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写的。武后说：「这是宰相的过错，怎么把这样的人才丢失了？」随着封建正统观念的逐步加强，骆宾王这篇檄文受到其后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多的重视，其意义和影响也超出了文学的范围。又有《帝京篇》，以赋的手法，铺写帝京的宏大，权贵的豪奢，与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在当时被誉为绝唱。

骆宾王也创作了不少以乐府名篇的诗歌，大部分是在从军戍边中写成，思想和内容都显得

很充实。《从军行》：『平生一顾重，意气溢三军。野日分戈影，天星合剑文。弓弦抱汉月，马足践胡尘。不求生入塞，惟当死报君。』写出了一个献身边疆、以死报国的慷慨志士形象。《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》写北方边情的紧急：『君不见玉关尘色暗边庭，铜鞮杂虏寇长城。天子按剑征馀勇，将军受脤事横行。七德龙韬开玉帐，千重龟垒动金钲。阴山苦雾理高垒，交河孤月照连营。』《从军中行路难》写南方边地的艰苦：『征役无期返，他乡岁月晚。杳杳丘陵出，苍苍林薄远。途危紫盖峰，路涩青泥坂。去去指哀牢，行行入不毛。绝壁千重险，连山四望高。』昔时闻道从军乐，今日方知行路难。』这些都是骆宾王亲身的经历和体验，是专写宫廷生活的『上官体』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骆宾王最后做了唐王朝宫廷斗争的牺牲品。他最终未能如愿战死疆场，而死于内乱之中，这确实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。这样的事在历代文学家尤其少见。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他身首异处，编造了种种关于他的最后结局。《旧唐书》说是『伏诛』，《新唐书》则谓『亡命，不知所之』。这是正史。而在孟棨的《唐诗本事》里，骆宾王则在杭州灵隐寺削发为僧了。《唐诗本事》说了宋之问贬官放还，游灵隐寺，月夜在长廊吟诗，只得二句：『鹜岭郁苍苍，龙宫隐寂寥。』就想不出来了。有老僧点长明灯，坐禅床上，为其续句云：『楼观沧海日，门听浙江潮。』第二天早上，宋之问再来访问老僧时，已经不见其踪影。寺里的僧人告诉他，老僧是骆宾王。这是野史。但这段故事编得实在离奇。故事中所提到的诗句，都赫然存之于骆宾王的《灵隐寺》诗中。诗云：『鹜岭郁苍苍，龙宫隐寂寥。楼观沧海日，门听浙江潮。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扞萝登塔远，剡木取泉遥。霜薄花更发，冰轻叶未凋。夙龄尚遐异，搜对涤烦嚣。待入天台路，看余度

石桥。『明明是骆宾王一人做的诗，现在却变成了宋之问与骆宾王两人做的。况且，骆宾王与宋之问并非未曾谋面。骆宾王诗集中有《在兖州饯宋五之问》、《送宋五之问》，说明二人见过面，有过交往，怎么会相见而不相识呢？孟棻的灵感大约来自诗中『夙龄尚遐异，搜对涤烦嚣』两句，殊不知这两句诗告诉我们，这首诗是作于『夙龄』即宾王早年，怎么会是晚年的诗句呢？真是破绽百出，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。宋代的吴炯大概看出了这些破绽，在他的《五总志》中，这个故事就换了一个说法，变成了骆宾王未显时，在杭州梵天寺打工，夜晚凭栏而立，见一老僧苦吟不已，只得二句：『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』冥思苦想，再不能得。骆宾王为其续句云：『楼观沧海日，门听浙江潮。』吴炯觉得骆宾王为僧的说法不可靠，但他又舍不得这个故事的神奇意味，便把骆宾王的身份、地位改换了一下，用诗中的五、六句取代了一、二句，显得与孟棻的故事有异，其实是换汤不换药。但他照样作为佳着端出来，请读者诸君品尝。两段故事都围绕骆宾王的名句『楼观沧海日，门听浙江潮』做文章，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。从此亦见以孟棻的故事来作为证明骆宾王归宿根据的不可靠。但人们怜惜骆宾王的才华，希望骆宾王不死的心情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四杰不是一个文学团体，而是一个文学群体，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四个文学家的总称。四杰的排名，起初也没有一个定准。中宗朝，郗云卿奉命编辑《骆宾王文集》，他在《序》中是这样排名的：『骆宾王，婺州义乌人也。高宗朝，与卢照邻、杨炯、王勃文词齐名，海内称焉，号为四杰。亦云卢、骆、杨、王四才子。』张说在《赠太尉裴公神道碑》中排名与此类似。这大概是以年庚来排列的。以『王、杨、卢、骆』的次序排名，在当时也同时出现，这大概是以成就来排列的。因而

有传说杨炯「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」的说法，卢照邻「喜居王后，耻在骆前」的说法。今已不能辨其真伪。但两种排列并不矛盾。

根据现有的材料，四杰的交往不是很多。从杨炯《王勃集序》谈到他与王、卢是文学革新活动中的知音、知己，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往，但很难作出具体的描述。骆宾王曾作《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》，卢、骆二人是否在蜀中谋过面，交好还是交恶，现也无法窥测。现在可以断定的，有材料依据的，王勃与卢照邻在蜀中曾有一段交往。总章二年（六六九）五月，王勃遭高宗斥逐，离开沛王府，自长安入蜀，而此时卢照邻在蜀为新都尉。大约在咸亨元年（六七〇）或二年（六七一），两人至少有两次一起宴游。春天，一起过三月三，并有诗作《三月曲水宴》纪游；秋天，又一起过九月九，二人与邵大震同游玄武山，亦并作诗纪游。王勃诗云：「九月九日望乡台，他席他乡送客杯。人情已厌南中苦，鸿雁那从北地来。」是在「南中」（蜀中）已久，急切盼望「北地」消息的时候。这个「北地」，既包括家中，也包括朝廷。他希望朝廷（高宗）回心转意，原谅他的过失，召他回去，给一个官做。卢照邻诗云：「九月九日眺山川，归心归望积风烟。他乡共酌金花酒，万里同悲鸿雁天。」也表达了「望归」的心情。「鸿雁」双关，既写眼前秋景，也含盼「北地」消息之意，二者同「悲」。咸亨二年（六七一）冬，朝廷铨选官吏，王、卢即赴长安参选了。杨、骆也参加了这次铨选。这是「四杰」唯一的一次极有可能的聚会，但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点。

由于四杰的才华和声望，主持铨选的吏部侍郎李敬玄有意给「四杰」授予官职，而另外一个主持铨选的吏部侍郎裴行俭对「四杰」有不同看法，他说：「看一个人要先看他的器量胆识，然